

西周金文与西周史研究暨
第十届中国先秦史学会年会论文集

王 晖 主编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 秦 出 版 社

目 录

青铜器中的古莱国与中原王朝	孙 进	1
夔国地望考辨	孔 华 杜 勇	10
周原刻辞“乍天立”与朕簋“王祀于天室”合说	陈立柱	26
新出金文与西周曾侯	罗运环	36
西周金文与齐官举隅	孙敬明 吉树春	42
叔犀父盃铭文正读及其他	陈 絮	50
作册吴盃“唯卅年四月既生霸壬午”解	桂珍明	55
邠国之姓商榷	张志鹏	62
梁其钟考释	陈颖飞	71
铸国史事辨疑	李 晶	85
性别视角下的两周“宗妇”	耿 超	91
金文“蔑历”检讨	鞠焕文	101
从金文“妻”的异构看甲骨文“妻”字的构形理据	暴希明	107
叶家山曾国墓地与西周早期南宫家族史征	胡嘉麟	119
鄂国金文综考	陈荣军	135
从“富”“福”“宝”三字的初文构形看先民们的生活追求	邵 英	144
仲山父模式：西周户政制度初探	王少林	153
也簋铭补释	赵燕姣	172
从明止砖“万岁不败”说金文流变	刘心田 朱明歧	179
传承与转折——西周青铜器铭书风之变新探	王 帅	184
西周金文与军制新探——兼说西周至战国车制的演变	王 晖	197
西周地方封国的政治体系初探	赵 薇 王 彪	215
由清华简《系年》再论“国人暴动”的性质	李秀亮	228
丰镐——西周王朝的地缘政治中心	田旭东	233
峻簋与西周王年	张闻玉	240
再论西周王年	黄怀信	250
晋国的始封之君——唐叔虞	李尚师	255
《尝麦》“敬功尔颂”笺释	张怀通	264
西周时期涇河流域的戎狄——以大河口西周墓地为研究中心	郭永琴	268
论周公思想文化及其现代意义	游唤民 汪承兴	278

清华简《尚书·金縢》与周公东征史事考论	吕庙军	289
从“周邦”双重含义看西周国家结构	雷鹤宇	296
由《尚书》《国语》相关记载论商周时期甸服制度的变革	武刚	304
论周公说“王德”以《尚书·金书》为探讨中心	杨兆贵	313
由清华简《系年》论两周之际的历史变迁	王红亮	323
西周成周城相关问题研究	蔡运章	俞凉亘 336
论成周是西周时期的经济中心	刘余力	周明霞 366
殷商铜器饕餮纹之文化释义	朱彦民	372
清华简《系年》“周亡王九年”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王伟	周喆 393
从清华简看克商之前周人的天命诉求	代生	408
清华简《厚父》“天降下民”句的观念源流与幽公盨相关铭文再释	宁镇疆	415
叶家山曾国墓地“分器”现象与墓葬年代另探	任雪莉	423
论西周晚期“宣王中兴”的原因和标志	杨东晨	434
《周礼》大宰八法研究	朱红林	445
“周道”的基础设施与管理制度的略述	刘伟	张莹 456
河湟洮岷地区青铜文化族别问题研探	李建胜	464
“六家要指”新论	张荣明	474
商周关系探微	郭胜强	李慧芬 482
西周陕北戎狄研究	何艳杰	494
殷商与霍泰山祭祀	杨晓国	503
周人与周原——周人周原百年崛起之原因简析	霍彦儒	506
鞏之战晋下军佐究竟为谁	李世佳	513
齐“雍廩杀无知”考	张淑一	519
春秋时期晋、鲁家臣比较研究	杨小召	523
秦公簋“在帝之坏”新解	鲁鑫	531
先秦巫者的祝诅放蛊活动	赵容俊	539
《春秋》所记灾异考	许兆昌	550
春秋战国的人性大讨论	张彦修	565
邹衍生平考论	魏建震	573
一粟居读简记（七）	王辉	578
郭店简《鲁穆公问子思》与儒家“以德抗位”精神	谢耀亭	589
上博楚简《容成氏》古史叙事建构及其思想旨趣简论	李学功	590
清华简《保训》篇舜帝上甲微故事疏证	赵均强	600
姜姓与羌族	周书灿	610
华夏与先秦古蜀的交流、互动与融汇初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早期历程的重		

要个案	彭邦本	617
殷周史官制度与“史谏”简论	夏保国	631
真相难觅：《赵氏孤儿》背后的历史重构	黄朴民	638
论原始宗教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发展的影响——以“绝地天通”“铸鼎象物”为例	江林昌	646
王姓祖根与毛国史实探研	张新斌	666
战国秦汉间黄帝材料发掘、敷衍、整合之再认识	张广志	672
释“氏”“族”与“氏族公社”	刘俊男	682
战国的武安君与武安城	张润泽	690
关于范雎之名的考察与思索	白国红	694
先秦秦汉儒学思想中的“和”“同”分殊探疑	柯 昊	702
闭幕谢辞	孙敬明	711

青铜器中的古莱国与中原王朝

孙 进（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

摘 要 莱国是胶东地区商周时期的古国之一。本文通过对有关青铜器铭文的考释与梳理，并与传世文献相印证，对西周时期地处偏远东方的莱国历史进行了探讨，指出其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参与了一系列周王朝主持的军事活动，从而揭开了上古史中鲜为人知的一段历史。

关键词 青铜器铭文；莱国；周王朝；征伐；东夷；淮夷；荆楚

古莱国是商周时期胶东地区较有实力的古国之一。其初始于商代，兴盛于西周，至春秋初期为齐国所灭。莱国的地域范围大致包括以今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归城遗址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在莱国的强盛时期，其边界西至胶莱河以东的潍河平原，东至胶东半岛中东部，北至渤海沿岸。有关莱国古史的记载散见于先秦时期的《左传》《国语》《战国策》与汉代的《史记》等文献，但多语焉不详，完整的莱国史无法复原。所幸的是，自清季以来，有关莱国史事的有铭青铜器时有出现，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王献唐的《山东古国考》、李白凤的《东夷杂考》于此多有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胶东地区的科学考古发掘取得了可喜进展，不仅有关于莱国史事的新出土的有铭青铜器，而且这些有铭青铜器大多有地层关系和明确的出土地点，且组合关系清楚，可以作考古年代学的研究，为我们进一步揭开莱国古史的神秘面纱提供了新机遇。邵望平、高广仁先生的《海岱文化与齐鲁文明》、孙敬明先生的《考古发现与齐史类征》等著作中的有关章节已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目前，学术界关于莱国历史的基本框架已建立起来了，接下来要讨论的是一些更具体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莱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以往，学术界几乎不敢设想，这么一个偏居东方海隅的蕞尔小侯国，与远在数千里之遥的中原泱泱王朝会有什么联系，传世文献也没有相关记载。然而，新出青铜器铭文却为我们揭开了这两千多年来鲜为人知的历史一面。本文试在前圣时贤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就此做系统梳理，希望能引起学界朋友的讨论与指正。

一、西周前期莱国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武王—穆王）

（一）鲁家沟出土铜器与成王、穆王时期的莱国军事活动

清代王道新所撰的《黄县志稿·金石目》记载：“光绪二十二年春，城东南鲁家沟田中，出古铜器十：钟三，鼎二，一鼎破碎，钟无款识。尚有壶一，盘一，盘无款识，壶亦破碎。若甗，若盃，若觶，皆有铭，俱归丁幹圃。”这里的“城东南”之城即今烟台市龙口的归城。这批青铜器共有六款铭文。陈梦家先生在《西周铜器断代》中又引述《山东金文集存》所录旅鼎铭文，说：“此鼎与禹鼎、禹甗都是‘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出土于黄县之莱阴’。”^[1]此外，唐兰、王献唐等学者也对这批铜器进行了考释，将时代定为西周前期，但细节之处多有相异。现综合各位学者的研究，将其中相关联的四件青铜器铭文用通行字隶定如下，并作释证：

莱伯鼎：“𣪠伯作旅鼎。”

旅鼎：“唯公太保来伐反夷年，在十又一月庚申，公在鬲白。公锡（赐）旅贝十朋。用作父尊彝。𣪠（莱）”

遇甗：“唯六月既死霸丙寅，师雍父戍在古白，禹从。师雍父佻使禹事于猷侯。侯蔑禹历，易禹金。用作旅甗。”

甗鼎：“唯十又一月师雍父省道至于猷，禹从。其父蔑禹历，易（赐）金。对扬其父休，用作宝鼎。”

现根据这组铭文，试讨论如下几个问题：

其一，人物关系与国属。

在这组有铭铜器里，莱伯鼎、旅鼎、遇甗、甗鼎四器的人物关系可以联系起来考虑。莱伯鼎铭文说“𣪠伯作旅鼎”，遇甗铭文也说“用作旅甗”。而遇甗铭文的“遇”与甗鼎的“甗”，据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认为当为同一人^[2]。由此可见，莱伯和遇（甗）都是旅的后代。他们应为同族人。

那么，他们属于哪个族属呢？这要从莱伯鼎铭文的“𣪠”字与旅鼎的族徽“𣪠”的考证入手。陈梦家先生在《西周铜器断代》中指出，莱伯鼎的“𣪠”字是“厘”字的省写，而“厘”又“假作莱，乃是莱国之名”，“莱伯之鼎出土于黄县莱阴，乃莱国之地。”^[3]旅鼎铭末所附的“𣪠”，乃是族徽，这在商代及周初铜器中习见，唐兰先生《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铭刻》一文中，直接将此族徽隶定为“来”^[4]。“来”当即“莱国”之“莱”。这样，就可以十分清楚地推断出，从旅到莱伯、遇（甗）

[1] [3]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五）》，《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

[2]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八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

[4] 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铭刻》，《古文字研究》（第二辑），中华书局，1981年。

都是莱国人。

其二，年代与史事。

关于这组铜器的年代，我们认为应该在西周前期的成康昭穆之际。就器型与纹饰看，旅鼎分裆，柱足，立耳，器身饰三组大兽面纹，与三足相应，兽面两侧有分解的躯体。张长寿、陈公柔、王世民《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一书根据这些器型与纹饰特点，将旅鼎的年代定为“西周早期成康时”^[1]。甗是旅的后代，因此，甗鼎的年代当晚于旅鼎。就器型与纹饰看，甗鼎作双立耳，三柱足，圆腹垂腹，口沿微侈，口下一周为分尾长鸟纹饰带。据此，张长寿等先生定其年代为“西周早期偏晚时器”，约在昭穆时期^[2]。

再就铭文内容看，旅鼎有人名“太保”。太保当即周初的召公。传世有太保玉戈，其铭文曰：“六月丙寅，王在丰，令太保省国，帅汉，遂殷南，令厉侯辟，用鼃走百人。”李学勤先生对此铭有考证，指出：“太保为周代三公之一，但无论在文献还是在金文中，西周的太保只有召公一人。《尚书序》：‘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可知召公之称‘太保’是辅相成王。考虑到玉戈不少地方承袭商末的特点，其年代很可能是成王时，特别是成王的前期。”^[3]旅鼎中的“太保”与太保玉戈之太保当为同一人。因此，“旅”也当是西周初年成康时人。这与张长寿等先生考证旅鼎的年代是相一致的。前文指出，莱伯与遇（甗）是旅的后代，因此，莱伯鼎与遇甗、甗鼎时代当略晚，这与张长寿先生考证的甗鼎年代“为西周早期偏晚时器”也是相一致的。

西周前期，成康昭穆之际，周王朝一直对东南淮夷、徐、楚实行征伐政策，这在《尚书》《诗经》《左传》等文献中多有记载。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又以青铜器铭文与之相印证，因而有关这一段史事已为大家所习知。值得注意的是，据上述旅鼎、遇甗、甗鼎铭文可知，在这些西周早期发生的重大史事中，莱国也参与其事，这却是不为以往学者们所注意的。

旅鼎记载在召公太保率师讨伐“反夷”的行动中，莱族祖先旅也在其中，而且因为表现出色，得到召公太保的赏赐。这就是铭文所说的“公锡（赐）旅贝十朋”，结果旅就为其父亲作了这件鼎以示纪念，称为“旅鼎”。

遇甗与甗鼎之主事者均为师雍父，时间上遇甗记为六月，甗鼎在十一月，所记亦为同一年事。师雍父当为王室大将，而莱族的禹为其属下。两铭的“馯”，当即“胡”字。《汉书·地理志·汝南郡》：“汝阴，故胡国。”《续汉书·郡国志》：“汝阴

[1] [2] 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

[3] 李学勤：《太保玉戈》，《李学勤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394~399页。

本胡国。”地在今安徽阜阳县。遇甗载，师雍父驻守在古地，而派遣遇由古地往胡，事于胡侯，这应该是一种军事上的联络；胡显然是王室军队师雍父的联盟对象。在这次讨伐淮夷的军事行动中，胡与遇都是有功之臣。而遇的地位又在胡侯之下，所以遇得到了胡侯的赏赐。甗鼎则记师雍父亲自由道至胡进行巡察，在这次巡察活动中，遇作为随从，第二次来到胡国。大约六月份遇由师雍父遣往胡国时，所做的工作不错，所以师雍父十一月亲自到胡国巡察时，对遇所做的先行工作很满意，亲自奖励了遇，这就是铭文所说的“禹从。其父蔑禹历，易（赐）金”。这里的“其父”即“师雍父”。

《后汉书·东夷传》载：“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可见穆王在伐徐夷的过程中，是采取既打击又笼络的方式。胡国当是其联络的对象。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释甗鼎时，引用了《后汉书》这条材料，并指出：“今观诸器文，一面言征戍，一面与胡侯复通往还，于此时事正合。”^[1]

前文指出，甗是旅的后代。旅鼎为成王时器，而甗鼎与遇甗的年代，郭沫若定为穆王时器，与张长寿等先生所定的“西周早期偏晚时器”相一致。由此，我们获得的信息是，在成王时，召公太保代表周王朝东伐“反夷”时，莱族的旅参加了。到了穆王时，师雍父代表周王朝实施既伐又联的淮夷军事行动时，莱族旅的后代遇（甗）又参加了。而且，无论是成王时的旅还是穆王时的遇（甗），表现都很出色，都得到了上司的赏赐。值得注意的是，旅鼎与甗鼎、遇甗都出土于莱国故地黄县莱阴。这说明他们功成受赏后，都回归故里，当时的莱族是相当繁荣的。他们定居在胶东，却可以听从中原王朝的调遣，奔赴千里之外参加周王朝军队讨伐“反夷”“淮夷”的活动，其实力、地位与影响真是不容轻视。

（二）小刘家村出土铜器与昭王时期的莱国军事活动

1969年，龙口归城小刘家村（今属归城曹家村）出土了四件西周早期青铜器，有卣一，尊一，卣盖一，解一。其中尊、卣、卣盖有铭文^[2]。

启尊：喇叭口，鼓腹，矮圈足，颈部饰波带纹，云雷地，带中间饰有突起的兽面，通高18.5厘米。底部有铭，3行19字，尾书徽号2字，共21字。隶定如下：

启从王南征，遶山谷，在洧水上，启乍且丁旅宝彝。戊簠。

启卣：子母口，鼓腹，喇叭形圈足，兽首提梁，腹、盖均饰一条波形纹带，云雷地，腹部带纹，中间饰突起的兽面，通高22.2厘米。铭文5行30字，尾书徽号2字。器盖对铭。隶定如下：

[1]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八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

[2] 李步青、王锡平：《建国以来烟台地区出土商周铭文青铜器概述》，《古文字研究》（第十八辑），中华书局，1992年。

王出狩南山，寇迯山谷，至于上侯澆川上，启从征，谨不扰。作祖丁宝旅尊彝，用匄鲁福，用夙夜事。戍籛。

启卣盖：饰饗饗纹，铭文1行3字。隶定如下：

卣（鬲）父辛。



启尊铭文



启卣铭文



启卣盖铭文

启尊铭文说“启从王南征”，启卣铭文说“王出狩南山”，“启从征”。唐兰先生《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长文认为，启尊、启卣所写都是指昭王南征事，其中启卣铭文所说的“王出狩南山，实际就是南征”^[1]。

关于周昭王南征事，见于《左传·僖公四年》及古本《竹书纪年》《吕氏春秋·音初》《史记·周本纪》等典籍，可以与传世文献相印证的青铜器铭文很多，如史墙盘、中方鼎、中甗、析尊、令方尊、方彝、令簋、召尊、召卣、静方鼎等。唐兰先生文已有详考。“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李学勤先生作《静方鼎与周昭王历日》《静方鼎补释》文，根据新出静方鼎铭文，对周昭王南征的年月日作了详考，认为昭王南征始于昭王十七年，终于昭王十九年，是一个系列过程^[2]。现综合李学勤先生的研究成果，可将文献与相关铜器历日的对应关系大致列写如下：

年代	传世文献	铜器历日
昭王十六年	古本《竹书纪年》： 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 《楚辞·天问》： 昭后成游，南土爰底， 厥利维何，逢彼白雉？	史墙盘铭文： 弘鲁昭王，广德楚荆，惟贯南行。

[1] 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铭刻》，《古文字研究》（第二辑），中华书局，1981年。

[2] 李学勤：《夏商周年代学札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

续表

年代	传世文献	铜器历日
昭王十七年		静方鼎铭文： 唯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会师中及静省南国。…… 中方鼎铭文（一）： 唯王命南宫伐叛虎方三年，王命中先，省南国。
昭王十八年		静方鼎铭文： 八月初吉庚申至，……（王命静）在曾，在鄂师。 中方鼎铭文： 十三月丁亥，王在寒次，王在岸。
昭王十九年	古本《竹书纪年》： 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曠，雉免皆震，喪六師于漢。 周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貫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 《左傳·僖公四年》 昭王南征而不復。 《史記·周本紀》： 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 《呂氏春秋·音初》： 周昭王親將征荊，……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祭）公扞于漢中。	析尊銘文： 六月乙酉，（王）命析覲望土于相侯。 令方尊、令方彝銘文： 八月甲申，……王命周公尹三事四方。 令簋銘文： 九月癸丑，唯王于伐楚，伯在炎。

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来讨论启尊、启卣，有两个问题大致可以得到解释。

其一，启尊、启卣所记启从王南征的年代，应该是在昭王十六、十七、十八三年间。这三年的昭王南征，节节推进，充满胜利气氛。启大概就在此期间受到嘉奖，而作器纪念。至于昭王十九年，已是全军覆没，没有从王南征而作器的可能。李步青、王锡平先生《建国以来烟台地区出土商周铭文青铜器概述》亦持同论，指出：“史载昭王南征不止一次”，而启尊、启卣所载应是从王“前几次的南征胜利而作器纪念”。^[1]

其二，启的身份。铭文中启的祖先为“祖丁旅”，又称“父辛”。用干支称祖父庙号是东方夷人或殷人的习惯，说明启是东部人，而非周人。铭文中“父辛”没有具体名，而“祖丁”则称为“旅”。我们前文指出，“旅”生活于成王时，是莱族先人。“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成王在位 22 年，康王 25 年，昭王 19 年。启是昭王后期的人，离成王已有六十余年，铭文中启称旅为“祖”，正相合。启尊、启卣出土于

[1] 李步青、王锡平：《建国以来烟台地区出土商周铭文青铜器概述》，《古文字研究》（第十八辑），中华书局，1992年。

龙口归城莱国故都，更进一步证明了启的身份当为莱族人。

如果以上推论不误，则再一次证明西周前期的莱国与中原王朝非同寻常的关系。在周昭王南征的重大军事活动中，莱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西周中期，莱国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恭王—夷王）

（一）史密簋与孝王时期的莱国军事活动

1986年，陕西省安康地区出土一件史密簋^[1]。簋通高（残）11.65厘米，口沿外径20.5厘米，内径20厘米，器深11.4厘米，最大腹外径25.3厘米，圈足残高0.6厘米。敛口，垂腹，圈足。就纹饰看，口沿下有窃曲纹带，窃曲纹中间有眼；腹部饰有瓦纹。李学勤先生根据这些器型与纹饰特点指出，“这种风格到西周晚期十分盛行，本器已开其先河，这说明将该器排在孝王时最为合适。”簋底有铭文9行，共计93字。现将李学勤先生隶定的史密簋铭文列下^[2]：

惟十又二月，王令师俗、史密曰：“东征。”会南夷卢、虎，会杞夷、舟夷，謹，不愆，广伐东国。齐师、族徒、遂人乃执鄙宽亚。师俗率齐师、遂人左伐长必；史密右率族人、厘伯、夔、夷周伐长必，获百人。对扬天子休，用作朕文考乙伯鬲簋，子子孙孙其永宝用。

该铭文大意为：周王命师俗、史密东征，合击南夷。因为南夷的两个国族卢、虎同另两个南夷国族杞、舟夷，扰乱周王朝东方领土。师俗、史密在这次战役中分兵出击，在长必这个地方围歼淮夷诸侯国。具体的情况是师俗率齐师与遂人从左面进攻长必；史密则率领族人、厘伯、夔、夷等从右边围攻长必。结果这场征伐战争获胜，取得了俘敌百人的战绩。据李学勤先生考证，史密簋的铭文字体与作于孝王三年的师振鼎等青铜器铭文字体非常相近；而且就史密簋本身的器形及纹饰特点看，已开启了西周晚期盛行的青铜器风格之先河，因此，可以认为史密簋铭文记载的应当是周孝王时期的一场伐南夷战争^[3]。

在这段铭文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次将领史密率领王朝军队伐南夷的军事活动中，有“厘伯”一族参与其间。“厘”即“莱”，当与前述黄县鲁家沟出土莱伯鼎铭文中的“莱伯”同为莱族人，也同样承担着中原王朝派遣执行的伐夷军事使命。这是周孝王时期莱国参加周王朝军事活动的佐证。有关这一问题，李学勤先生《史密簋铭所记西周重要史实》、张懋镕先生《安康出土的史密簋及其意义》均有详论，读者可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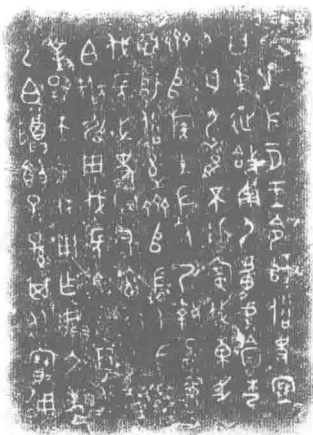
[1] 李启良：《陕西安康市出土西周史密簋》，《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3期；李学勤：《史密簋铭所记西周重要史实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年第2期；张懋镕：《史密簋发现始末》，《文物天地》1989年第5期；张懋镕、赵荣、邹东涛：《安康出土史密簋及其意义》，《文物》1989年第7期；吴镇烽：《史密簋铭文考释》，《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3期。

[2] [3] 李学勤：《史密簋铭所记西周重要史实》，《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0~176页。

（二）师寰簋与夷王时期的莱国军事活动

清代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批校《筠清馆金石文字》，著录有西周时期铭文青铜器师寰簋，谓“出登莱地，归余器、盖二”。该器现藏上海博物馆，口下和盖缘均饰一周窃曲纹，腹饰瓦纹，圈足饰一周垂鳞纹。双耳上端有双角高耸的兽头。三足有兽头，足尖呈象鼻形。张长寿等《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判定该器的年代为“西周晚期偏早时器”^[1]。器内底有铭文 10 行 115 字，又重文 2。现将铭文隶定如下^[2]：

王若曰：“师寰，越淮夷繇我帛贿臣，今敢搏厥众，假反厥工吏，弗迹我东国，今余肇命汝率齐师、**冀**、厘、焚、夷，左右虎臣，征淮夷。既执厥邦首，曰冉、曰莽、曰铃、曰达。师寰虔不附夙夜，卹厥将事，休既有功。折首、执讯无谟，徒馭欧俘士女牛羊吉金。余弗遐组，余用作朕后男腊尊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史密簋铭文



师寰簋

这篇铭文提供的主要信息是，本应向周王朝进行贡纳的淮夷不服，周王命令师寰率齐、**冀**、莱、焚、左右虎臣征伐淮夷，获士、女、牛、羊、吉金等。

与史密簋铭文内容相似，在师寰簋铭文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以师寰为首的周王军队中包括有**冀**、莱两国。“**冀**”即“纪”，“厘”即“莱”。**冀**与莱都是当时胶东地区具有一定实力的诸侯国，他们均率领自己的军队越过数千里之遥参加周王朝的伐夷军事活动。

李学勤先生指出，“师寰簋所记的兵力，只比史密簋增加了一个纪国，说明两器所述的战争都是针对淮夷的。只是从器型、字体看，师寰簋的年代比史密簋要略晚一些，战果也更多一些。”^[3] 仔细对比两器的铭文内容，可以从中发现许多相类似

[1] 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

[2]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八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

[3] 李学勤：《史密簋铭所记西周重要史实》，《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0~176页。

之处，兹列表对比如下：

器名	周王室主帅	所率军队	征伐内容	战绩
史密簋	史密、师俗	齐师、厘伯、楚、夷	东征，伐长必	获百人
师寰簋	师寰父	齐师、翼、厘、楚、夷	征淮夷	折首、执讯无 谋，徒取欧俘 士女牛羊吉金

由上表可知，两次征伐都是在周王室主帅率领下，均有莱族部队参加，征讨对象皆为淮夷。词句语气亦极相近，则两器所记史实的时代亦当相近。李学勤先生考证说：“厘”即“莱”，“楚”即“偃阳”（妘姓古国，在今山东枣庄），“夷”即“夷国”（妘姓古国，今山东即墨西），三国均为夷人国家。史密簋铭文所记史实为西周孝王时的战事，师寰簋铭文所记史实“最晚只能在夷王之初”。^[1] 两器记述的都是西周中后期周王朝对淮夷先后进行的两次征伐。传世文献及出土青铜器铭文对此间伐淮夷之事多有记载，此不赘述。总之，仅从这两次时间相近的伐淮夷战争来看，直到西周中期，莱国仍追随周王室参与一系列军事活动，与周王朝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对稳固周王朝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小结

通过以上考古发现可以看出，莱国与周王朝的关系至少贯穿成王、昭王、穆王、孝王、夷王等西周各时代。在西周初期，莱国臣服于周王朝，作为处于胶东半岛东北部地区的封国之一，在周初借助于自己的强大势力，几代领主从西周早期至中期多次积极参与周王朝对诸夷的军事平叛与治理，并获封赏。这既取得了周王朝的信任与支持，密切了与周王室的关系，同时也巩固了自身在东夷地区的势力范围，实为一举两得。总之，就整个西周时期来看，莱国与周王朝的关系是十分密切而稳固的，从莱国频繁参与周王朝军事行动的情况看，两者间的亲密关系并不亚于齐国与周王朝的关系。值得说明的一点是，进入春秋时期至莱国灭亡期间，均未发现记载有莱国与周王朝关系的青铜器铭文。究其原因，大概有两方面：一是春秋时期，周王朝势衰，对各地诸侯的控制日渐松散，无力出兵征讨；二是由于莱国的西邻齐国在齐桓公执政期间锐意改革，其政治、经济及军事势力强大起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野心勃勃，急剧扩张。莱国不断面临着被侵蚀吞并的危机，疲于自保，已无暇听命于周王室的派遣。迫于齐国的东扩，莱国的势力范围由原来以今临朐为西界的中心地带不断往东退缩至胶莱河以东，直至春秋末年终于被齐国兼并。有关此事，文献有载，此不赘述。

[1] 李学勤：《史密簋铭文所记西周重要史实》，《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0～176页。

箕国地望考辨

孔华 杜勇（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 箕国是商周时期一个颇有实力和影响的古老方国，但它和文献中的杞、纪、莱诸国各为独立族邦，没有等同关系，不可混为一谈。商末周初箕族的封地距周初的燕国不远，应该是符合实际的，只是其确切地望还有待今后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箕族与燕侯有主从关系，实为燕国的附庸。两周之际，箕国为避戎祸将都邑迁徙到山东黄县一带，而非莒县北部。虽然前后两个箕国在时空上有所不同，但他们同为侯爵，并与周王室保持婚姻关系，若非同一邦族，绝无如此巧合。周朝统治者经略北土，对于箕国族众，采取承认爵秩、实行政治联姻、屡加奖赏等多种安抚措施，有效地增强了箕族对周王朝的向心力，使之成为归服于周并称臣纳贡的异姓诸侯。箕国臣服周王朝后，与周王朝一直保持密切合作关系，对于维护周人在北土、东土的统治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 箕国；地望；纪国；偃侯；黄县

箕国是商周时期的一个古老方国。由于它在传世文献中渺无踪迹，仅甲骨文、金文略有所见，故其史迹一直处于扑朔迷离之中。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箕与杞、纪、莱等国的纠葛，箕国的地望及其变迁，以及箕国与周王朝的关系等问题略作探索，以期形成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

一、箕与杞、纪、莱等国的纠葛

在周代箕国历史的研究中，有的学者把它同文献中的杞、纪、莱等视齐观，认为他们是同一邦国的不同名称。这种看法或有不当，有必要先作辨析。

（一）箕与杞的关系

《说文·己部》：“箕，长踞也。从己其声，读若杞。”许氏所谓“读若杞”，不过注音而已，并非认定箕与杞为同一国名。南宋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解箕公匜之箕为杞，并说：“箕者，古国名。卫宏云：‘与杞同’。”段玉裁注《说文》驳议云：“盖卫宏以箕为杞宋之杞，此出唐人所谓卫宏官书，多不可信。即如此条，乃因许语而附会之也。”^[1]晚近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对段注不以为然，认为杞侯在武丁时作杞，

[1]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书店，1992年，第741页。

到帝辛时便作彘侯，“杞，彘，古今异字，便易误认为两国”^[1]。郑杰祥认为彘“或即后世杞地，位于今河南杞县境”^[2]。前者以彘为国名，后者以彘为地名，并无实质性区别。

《史记·夏本纪》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所列十二国族中即有“杞氏”。《大戴礼记·少闲》篇亦云：成汤“乃迁姒姓于杞”。杞为姒姓，文献记载是明确的。而彘为姜姓，则有金文资料可证：

彘孟姜匚：“王妇彘孟姜作旅匚，其万年眉寿用之。”（《殷周金文集成》，下文简称《集成》^[3] 10240）

彘公壶：“彘公作为子叔姜媵盥壶，眉寿万年，永保其身，它它熙熙，受福无期，子孙永保用之。”（《集成》9704）

彘侯簋：“彘侯作彘邢姜妣母媵尊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下文简称《近出》^[4] 470）

彘孟姜匚属于王妇自称名的形式，“王妇”是沿用殷人传统，这里指周王之妇。“彘孟姜”则是“父家氏名+排行+父家族姓”的表述形式。彘公壶和彘侯簋均属陪嫁的媵器。一般而言，父母在为女儿作媵器时，对女儿的称呼必须加上“父家族姓”^[5]。是知彘为姜姓无疑。

杞与彘既不同姓，当然不能以同一族邦视之。这一点，早在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就已正确指出，“杞乃姒姓之国，此彘乃姜姓之国，彘与杞非一也”^[6]。如今彘非杞国已成学者共识，无需多论。

（二）彘非纪国

彘为纪国的见解，最早似为余永梁所提出：“彘后省作己，经典作纪。”^[7]郭沫若在彘公壶的考释中说：“余谓彘亦是纪，同一纪国而作彘若己者，亦犹句吴之作工𡗗若工吴。”^[8]此说影响甚巨，成为目前学术界的主流意见。

纪为姜姓，文献有载。《世本·氏姓篇》：“纪氏，姜姓，炎帝之后，封纪，为齐

[1] 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3页。

[2] 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74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2007年。

[4] 刘雨、卢岩：《近出殷周金文集录》（简称《近出》），中华书局，2002年。

[5] 陈絮：《商周姓氏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15页。

[6] [8]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八卷，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200页。

[7] 余永梁：《金文地名考》，《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5集），1928年第53～54期合刊。

所灭，以国为氏。”《通志·氏族略》亦云：“纪氏，炎帝之后，侯爵，姜姓。庄四年，齐灭之。”纪在金文中作己，且为姜姓确然无疑。己侯貉子簋铭云：“己侯貉子分己姜宝，作簋。”（《集成》3977）郭沫若考释说：“此乃纪侯媵女之器，有己侯钟出土于山东寿光县纪侯台下，可证。又纪乃姜姓，此言‘分己姜宝’者，即纪女将嫁，作宝器以媵之。”^[1]己侯簋铭亦云：“己侯作姜萦簋，子子孙其永宝用。”（《集成》3772）此亦为媵器，姜萦即己侯之女。这些都反映了纪为姜姓的事实。

纪为姜姓之国，位于今山东寿光市境内。《左传·隐公元年》：“纪人伐夷。”杜注：“纪国，在东莞剧县。”《通志·氏族略》说：“纪讹为剧，在青邱临朐县东寿光县西。”其实，剧非《通志》所言为纪字之讹。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輿纪要·山东六》“寿光县”条考证说：“剧城，县东南三十里。亦曰剧南城，春秋时纪国地。汉置剧县。……纪城，亦在县东南。刘昭曰：‘剧县西有纪城。’亦曰纪亭，故纪国也。城内有台，俗名纪台城。《春秋·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违齐难也。战国时为齐之剧邑。”^[2]这说明纪在寿光，其历史沿革非常清楚，不存在字讹问题。

由于曷与纪国同为姜姓，音读又同从己声，因而郭沫若主张二者为一国之异名很容易被人接受。但是，王献唐认为这个结论并不可靠。他主要从两个方面提出质疑：一是经传史籍中的国名纪，“金文都作‘己’，从来没有把‘纪’写作‘曷’的证据，更没有把‘己’写作‘曷’的证据”。二是纪国灭亡于鲁庄公四年，而黄县出土的曷国铜器已不是春秋前期，难道纪国灭亡以后，“还能更改国号书体为曷，再铸造铜器吗？这是纪、曷铜器最主要的时间矛盾”^[3]。以今观之，这两条理由还是可以成立的，只是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如把“曷”写作“己”的证据，虽未见于金文，却在郭店楚简《缁衣》中出现了。简文说：“则民至（致）曷以悦上”^[4]，其中“曷”今本《礼记》即作“己”。至于黄县曷国铜器，王献唐认为并非春秋前期之物，这在时间上也很难截然分开。

对王献唐关于曷非纪国的看法，当人们还处在信疑参半之时，己、曷两国铜器同出一墓的报道似乎一下子打破了僵局。不仅纪、曷一国说令人深信不疑，而且还有人进而提出纪、曷、莱一国说。

1969年，在烟台上夼村抢救发掘了一座古墓，遗物中两件铜器铸有铭文。一为曷侯弟叟鼎：“曷侯易弟叟司或，弟叟作宝鼎，其万年子子孙永宝用。”（《集成》

[1]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八卷，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99页。

[2] [清]顾祖禹著，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輿纪要》（四），中华书局，2005年，第1638~1639页。

[3] 王献唐：《山东古国考》，齐鲁书社，1983年，第67~68页。

[4]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29页。

2638) 二为己华父鼎：“己华父作宝鼎，子子孙孙永用。”（《集成》2418）据发掘者推断，“这几件异国器，就其形制纹饰看，属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并认为“上乔村异国墓两鼎铭文一作‘異侯’，一作‘己华父’。两器同出一墓，应系一人之器，即墓主名叟，号华父。当然也有可能己华父是異叟的长辈，但从鼎的形制看，无甚差别。不管怎样，同是一个家族是不成问题的。证明異、己本系一国之称。”^[1] 这个意见迅即得到学者的呼应，认为“原报道认为作器者系同一人，华父是字，是正确的。‘己’‘異’互见，证明‘異’在周金文里是‘纪’的又一写法，而不是另一姜姓国”^[2]。还有学者说：“这个姜姓异国和文献中的姜姓纪国是否一国，近代曾有争论。1969年烟台上乔的一座墓葬中出土了異侯鼎和己华父鼎，異器与己器共存于一墓的事实结束了以往的争论，证明異、纪（己）确系一国。”^[3]

事情恐非如此简单。实际上，異、己（纪）两国铜器同出一墓，并不能有效证明二者同为一国。设若異、己为一国之异名，何以同一时期同一人作器要一字二写？须知国名的确定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異侯弟叟既为本国高级贵族，对众所周知的国名使用假借字，这就说不上严肃了。至于两国甚至三国铜器同出一墓，本有各种原因，不足为怪。如殷墟西区墓地即有同一墓组或同一墓葬出现两种以上族氏铭文的情况，或者可用族或分族之间的婚姻、联盟等关系来解释^[4]。1981年，山东临朐乙墓就发现过分别属于曾、齐、郟三国的铜器^[5]，表明三国存在一种文化交流关系。1984年，陕西张家坡邢叔墓出土的两件邓仲牺尊，即是邓国和邢国存在婚姻关系的证据^[6]。青铜器是可移动物品，或被掠夺、被赏赐、被馈赠，或因赠贖制度用于助葬，都是可能的。纪、異两国同为姜姓国家，虽不存在婚姻关系，但不排除因赠送、助葬等原因导致异国铜器同出一墓的可能。故难以根据異侯鼎和己华父鼎出于同一墓葬就判定異与纪为一国之异名。

从目前新见考古材料看，当初王献唐提出異、纪非一国的见解仍可信据。

其一，虽然战国竹书有“己”与“異”同音假借现象，但作为国名在出土文献中从不混用，至今未曾出现二者相互替代的文例。至于異器与己器同出一墓，如前所言有多种可能性，并不构成異与己同为一国的直接证据。

其二，己国在商周时期的称名，始终未曾改变。陈梦家所编《海外中国铜器图录》，谓国族分合迁徙，称名往往先后不同，并举異国为例，认为殷末周初纪国称名

[1] 李步青：《烟台市上乔村出土異国铜器》，《考古》1983年第4期。

[2] 李学勤：《试论山东新出青铜器的意义》，《文物》1983年第12期。

[3] 王恩田：《再说纪、異、莱为一国说》，《管子学刊》1991年第1期。

[4] 韩建业：《殷墟西区墓地分析》，《考古》1997年第1期。

[5] 临朐县文化馆等：《山东临朐发现齐、郟、曾诸国铜器》，《文物》1983年第12期。

[6] 张长寿、卢连成：《长安张家坡西周井叔墓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第1期。